

红高粱·张艺谋写真



618
=2

罗雪莹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红高粱： 张艺谋写真

罗雪莹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8 北京

609X 38/04

内 容 说 明

《红高粱》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奖。其导演张艺谋立即成为新闻人物。人们笑称他为电影界“得奖专业户”。《黄土地》、《老井》、《红高粱》，从摄影到表演到导演，伴随着他的次次获奖，他身上的传奇色彩越来越浓。

其实，张艺谋就是张艺谋，他有对艺术执著的追求；有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他也有自己的烦恼、痛苦。本书作者是张艺谋的知交，掌握了许多详实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张艺谋的语言，向读者倾诉了他——张艺谋对艺术苦苦的恋情，展示给读者一个自强、求异的精魂。

红高粱就是张艺谋追求的艺术个性的写照。

电影专业工作者和电影爱好者阅读本书，不仅可以了解张艺谋这位影坛奇才，还可得到多方面的启示。

责任编辑：仲 夏

封面设计：万 庆

红高粱：张艺谋写真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 1092毫米1/32 印张：2.5 插页：10

字数：40000

印数：30000

1988年7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106-00189-9/J · 0136 定价：1.30元

目 录

“嘿，真棒！就拍这块土”	(2)
“金鸡的奖赏使我觉得任重而道远”	(7)
“不值得把个人的不幸反复咀嚼”	(12)
“削发明志，背水一战”	(16)
“永远记着自己是一个中国的艺术家”	(22)
“愿为天明肝脑涂地”	(26)
“你就当他是真人真事，真的照那么去做”	(33)
“赞颂生命的自由舒展”	(38)
“向往创造的伟大辉煌”	(45)
“西柏林这只红绣球不只打在我一个人头上”	(53)
“这颗心太高太大”	(59)

附录：

《黄土地》摄影阐述	张艺谋 (66)
《红高粱》导演阐述	张艺谋 (71)
《红高粱》歌曲两首	
酒神曲	(74)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75)

在许多人眼里，张艺谋简直是个谜。瞧！他198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先后涉足摄影、表演、导演三个行当，样样干得出类拔萃！大家夸他是“奇才”，戏称他是“电影界得奖专业户”。虽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可作为朋友，我却企盼着艺谋的事业步步成功。因此，这一连串的告捷自然使我无比欣喜。然而感触最深的，是他走到今天多么不易！从中国影界的无名小辈，到在国际影坛一举夺魁，这中间仅仅相隔五年。五年的时间只不过是人生中短暂的一瞬；但在艺谋的艺术道路上，却是一个有声有色的篇章。他留下的每一个结结实实的脚印，都给我这样的启示：只要奋发努力和勇于创造，每个人都有可能比实际中的自己更伟大。他的成功，是人的精神、人的力量的证明。

“嘿，真棒！就拍这块土”

我初识艺谋，是1984年冬，影片《黄土地》在北京试映时。我请导演陈凯歌谈创作体会，采访结束后，他对我说：“你一定要找艺谋聊聊，他是我们这拨人里不可等闲视之的一个”。

此前，我已为艺谋在影片《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中展露的才华所折服，电影学院老师们对他的夸奖又不绝于耳。因此，我去北影招待所采访他时，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影坛新秀，着实怀着几分敬意。

我常听人讲起“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不少才华出众者也的确相貌平平、边幅不修。但初见之下，艺谋的平实质朴，仍旧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方脸，光头，一身发旧的蓝劳动布工装；身材不算高，却生了两只走路沉稳的大脚和一双刚劲有力的大手。让座、沏茶的动作有点笨拙，拘谨腼腆中透着一片实诚。我心里寻思着：与其说他是个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不如说更像个乡镇企业的临时工。

初次见面对艺谋有这种印象的，怕不止我一人。《老井》的编剧郑义这样描绘他：“相貌极平常朴素，尤其令人呼吸舒畅的是，绝无影圈名流不易脱俗的牛皮哄哄劲儿。说是国内著名摄影，不如说是闯进西影村叫卖鸡蛋、豆腐的农村小贩。”

1986年秋，艺谋从《老井》外景地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找莫言敲定《红高粱》的拍摄权。大概是跟太行山的石头打了几个月交道的缘故，他又黑又瘦，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脚上的凉鞋还咧开了口。莫言一见直乐，说艺谋挺象他们村的生产队长。

别看艺谋外表一副木讷憨实相，可话题一转到《黄土地》，他便俨然换了一个人。不但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而且满脸满眼也透着神采：

“古人说，作画贵在立意，意在笔先。我想，摄影也是这个道理。首先得有想法，片中众多的手段、技巧，都是围绕这想法而来。有人看过《黄土地》之后问我：‘你们这拨年轻人，不贪城市繁华，不恋江南秀色，而是好粗犷，好力度，这挺棒！但陕西有黄河，有秦岭，有石头，为什么你们单拍那块土？’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对黄土地有着一种本能的爱吧，而且爱得特别深，所以，哪个镜头不带上点土，心里就不舒服。

“要说对这土的感情从何而来，还得从1983年冬我和凯歌、何群（《黄土地》美工师）的陕北之行说起。我们几个人冒着风雪严寒，在黄土高原上走了一个多月。看了腰鼓，听了信天游，见了黄河，坐了老汉的炕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块十余丈厚、方方正正的黄土地，它能勾起你万般情怀。因为是冬天，黄土都裸在外面。树很少，鸟便也少。坡上极静，只有呼呼的风。十里、二十里，几孔窑洞，便成村落。黄土一直延伸到天边，望也望不到头。庄稼人世代代耕它，犁它，靠它活命，死了也埋在这土中。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也仍然如此。所以他们称自己为‘受苦人’。这里缓慢、沉重的生活节奏，常使我想起史铁生小说《我那遥远

的清平湾》中的一段描写：‘……夕阳就要落下崂顶，吆牛声回荡在土地和天空，悠长而又悲怆。第一个是犁田的，第二个是点种的，第三个是撒粪的。小小的行列在广阔的土地上缓缓走去，就象我们民族走过的漫长而又艰难的历史。……’

“庄稼人世代都这样走过来了，世代却又不满足。于是，便把心中想的都编进信天游里，一嗓子吼出去，声音在这黄土的世界上游来荡去，便成娱乐，便是解脱，便有精神。一个人能唱几天几夜，一群人能听几天几夜，一起哭也一起笑。庄稼人便也画画儿，羊是绿的，牛是红的，猪在天上飞，管它真的假的，颜色涂得越鲜亮，心中便越快活。那种返璞归真的朴拙，让你心里特别感动，外国人称这些农民画家是‘东方毕加索’，可我觉得比毕加索还要伟大得多！这些庄稼人便也打起腰鼓，老汉娃娃都打，九村十八店都打，打得兴起时，几十人舞成一团，命都不要了。我看后全震了，比“迪斯科”要现代得多。最后，便有这数不清的陕北人，扔下锄头拿起枪，跟了共产党，去拚命，去打天下……。升华一步讲，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整个中国不也是一个穷地方的一群比较穷的人吗？但千百年来，我们民族一直在对光明和幸福进行着执著的追求。

“有天黄昏，我们一行人爬上佳县的一个高山崂，四面望去，全是梁，全是崂，全是黄土。一块好大好厚的土！沉稳地坐在这儿，不知多少年了，象个老人。在冬日淡淡的残阳下，这土坡博大、雄伟、悲怆。众人呆呆地站在那里，半晌，我喊出声来：‘嘿，真棒！就拍这块土！’”

艺谋一面说，一面递给我一份《黄土地》摄影阐述，那上面写着：

“我想表现天之广漠，地之沉厚；想表现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民族精神自强不息；想表现人们从原始的蒙昧中焕发而出的呐喊和力量，从贫瘠的黄土中生发而出的荡气回肠的歌声，以及在愚昧和善良中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

“我们能拍摄的内容很少——土地，窑洞，黄河，四个人物。然而，‘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

“我们的艺术追求是：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静为主，静中取动；设色取强烈，不取清淡；构图取单纯，不取繁复；……”

我读过许多情文并茂的艺术阐述，却没有一份象艺谋的文笔这样，使我产生如此强烈的“文如其片”的感受。艺谋的文字象他的画面一样，精炼、凝重、个性鲜明；他的画面又象他的文字一样，气魄宏伟、意境高远。

艺谋在物质生活方面很不讲究，连他本人都说自己有点象“苦行僧”。上大学和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时，宿舍的床上就铺一张草席，连褥子都不垫。拍《黄土地》时，凯歌说他“衣着简单，除单衣裤外，拍戏两个月，就穿一双胶鞋，又不穿袜子。一脱鞋，非让人窒息才罢。不得已，每晚提入浴室放置，次日清晨取出仍臭不可闻”。他到北京参加金鸡奖评奖活动，只带一个装满书的小挎包。贴身的衬衣洗了，没得替换，光板穿毛衣外加一件军大衣，自我感觉挺舒服。在外出差常常赶不上正餐，一块面包，一杯白开水甚至自来水就打发了。

可对待艺术，艺谋却精益求精，恪守“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的座右铭。他轻易不说这东西“挺

棒”，至多说“有点意思”。拍《黄土地》时，摄制组送给他一个绰号“张黑脸”，只要听说“艺谋又黑脸了”，那就是拍摄上有问题了。凯歌在《秦国人》这篇文章中曾写过个挺生动的例子：

“一次，在窑内拍日景。为使光效真实起来，艺谋就须调整窑内外光比。一条拍过，他站在那儿黑着脸不出声，半晌才说：‘外面毛得太厉害了，要是窑外有一座灰楼就好了。’众人都笑：外边除了土坡就是山岭，这窑洞本身还是何群打的，何来灰楼！他不笑，只是发呆，身上的黑粗布大襟棉袄的衣襟吊着，象一块大擦嘴布。

我对他说：‘下一镜机位不动，这样……’

他说：‘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照明组长对他说：‘怎么着，大师，灯就不动了呵！’

‘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演员掩口而笑：‘行了，魔症了。’

十天以后，样片来了，看完以后，我问他的感觉如何。‘还行。’他说。他说完了，我心里念佛。”

看过《黄土地》的观众，可能还记得影片中翠巧给顾青送行的画面。翠巧身后的山都是流线型的，象女人柔美的胴体；而顾青身后的山则全都棱角分明，昭示着男人的坚毅。你们可知道，艺谋为了选到这个既怀阴柔之美又富阳刚之气的景，跑了多少山路？难怪扮演顾青的演员王学圻说：“拍《黄土地》时，我光演爬山的戏就磨破了两双布袜子。导演和摄影师扛着机器攀梁下沟遍山找景的辛苦，就可想而知了。”

我想，以艺谋这样在创作上立意之深、要求之严，再加上不凡的艺术情趣，《黄土地》怎能不拍得令人耳目一新？

“金鸡的奖赏使我觉得任重而道远”

看《黄土地》，就象读一首对大地母亲的抒情诗。那一幅幅凝重、空灵的画面，深情吟诵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艺谋这种凝炼、写意的笔法，是否师承于中国古典美学之精华？

“我觉得这可能跟老祖宗有点关系。我平时什么书都看，各种影片、美展都看，特别喜欢了解我未涉足领域的东西，总想多学、多吸收。但比较起来，我最喜欢凝炼的艺术、表现的艺术。祖先的《画论》、《诗论》等等，有书就买，边看边在书上划道道。上大学时为了写毕业论文和准备答辩，我真读了一些古典美学的书，作了许多索引，算是做了点学问。我发现，自己创作中的许多探索，都可以在古人那里找到美学依据。比如《黄土地》中‘腰鼓’、‘求雨’两场戏，就从老子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那里得益匪浅。我总觉得现在的人表达东西不如祖先好。我是西安人，特喜欢长安画派。赵望云、石鲁画黄土高原，大块厚实，枯笔特多。他们以墨当色，大笔勾勒，将陕北千沟万壑的历史感、沉厚感和干燥感表现得非常充分，绝不象潮呼呼的江南小景。我去看茂陵、霍去病墓石刻，一块飞来石，就告诉你是虎、是马，神似！秦砖汉瓦块儿有多大，秦腔黑头称得上苍劲粗犷，连陕西小

吃都比别的地方气派！所有这些，都对我的审美情趣有挺大影响。”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老祖宗那里汲取灵感，追求“返璞归真”的《黄土地》，在电影形态上却赶上了当今世界电影发展的一支重要潮流——“爱森斯坦的再复活”，从而受到了国际影坛的注目。

1985年5月，《黄土地》在第九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引起轰动，荣获十部国语片第一名。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十多家报刊争相载文，称该片是“近年来最佳的中国电影”。

香港影评家列孚撰文说：“张艺谋在处理画面和构图、造型、色彩、布光等方面，体现了大陆一代影人在艺术上勇敢的探索——而且是成功的探索。”

澳大利亚汉学家、影评家白杰明撰文说：“《黄土地》最突出的成功之处，无疑是张艺谋的摄影。特别是画面构图，在中国影片中稀罕之极。由于它具有浓重的水墨画特色，并且较理想地结合了中西方美学特点，张艺谋的艺术风格必将成为中国电影美学专家们钻研和探索的对象。”

1985年6月，《黄土地》在瑞士鲁迦诺亚非拉三大洲国际电影节获银豹奖。

1985年11月，《黄土地》导演陈凯歌在伦敦国际电影节获萨特兰奖杯。

1985年11月，《黄土地》摄影师张艺谋在法国南特国际电影节获最佳摄影奖。

1985年12月，《黄土地》导演在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获东西方文化奖，摄影师张艺谋获柯达最佳摄影奖。

需要指出的是,《黄土地》并不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早在它问世之初,国内电影界的有识之士就对这位“衣冠脱俗、气度非凡”的陌生青年来客伸出了热情之手。1985年春在深圳蛇口举行的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会议上,《黄土地》成为25位著名电影艺术家、评论家讨论的热门话题。

我作为评奖活动的工作人员,有幸亲聆了评委们的发言。许多老前辈对《黄土地》及其创作者表现出的深切的理解和热忱,令我感动不已。

“怎么能说《黄土地》是猎奇,是展览愚昧?对于凝固的历史、凝固的生产力,包括相当凝固的电影文法,我们的孩子们不能再容忍了!他们敢于法乎法外,他们有出息!”

“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的突破,往往都是以青年人的迷恋和疯狂打开突破口的。要用我们这些人已经获得的艺术地位、社会地位,让年轻人大胆去闯、去飞!”

对于《黄土地》摄影的成就,评委们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

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电影教育家沈嵩生说:“影片摄影大笔挥洒,大起大落,粗犷浑厚,构成了全片的造型基调和造型风格。动静结合的造型处理,构成了影片鲜明的节奏感。”

剧作家陆柱国说:“整部影片包含着创作者对我们这块贫困的土地和落后的人民的深沉的爱,而这一切,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环境、气氛和情绪的渲染来表现的。在这方面,摄影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评论家罗艺军说:“《黄土地》给我国电影带来的是一种质的新意。腰鼓、求雨场面的处理,把我国传统美学中侧重于写意的特色通过电影形式表现了出

来，是一种具有美学意义的探索。”

作家、表演艺术家黄宗英说：“摄影体现出编导用文字描述不清、难以体现的一种对于我们广袤的土地和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深沉的思考。摄影的力量实际上已经超出了银幕画面。”

.....

当我亲手把授予张艺谋金鸡奖最佳摄影奖这一沉甸甸的评奖结果郑重记录在案时，内心的激动难以言喻。艺谋，你降生于九朝古都西安，沐浴着煌煌华夏文明。你对这块土地和人民的赤子之爱和无尽的情思，都通过画面流泻而出，并且令专家们感悟至深。假如你知道了这一切，该会何等的喜悦！

艺谋是个实在人，从生活到艺术都厌恶“矫情”。比如，他从不把自己的创作初衷吹得云山雾罩：“我当初拍片时真没那么多哲理。即使有点想法，也不象后来评论家捋得那么清晰。咱不能把一分说成十分，越侃越玄！”

对于金鸡奖，他既不象有些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也不学“愤怒青年”对一切都“混不吝”。因此，当我急匆匆从蛇口飞回北京，向正在参加“青年导演、摄影研讨会”的艺谋透露他获奖的消息后，他用质朴无华的语言表达了内心的感动：“人其实挺简单，无论他再成熟，即使是80岁老头儿，也会有儿童般的天真心理——自己付出的努力一旦得到承认和报偿，就会觉得温暖、增强自信。这个奖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使我感到这社会、这生活还是有希望的。任重而道远，我日后一定得把片子拍得更好。”

几年来，我作为中国影协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深谙金

鸡奖创办和坚持之甘苦。而这个奖毕竟以它公正无私的品格，使“学术、争鸣、民主”这一评奖原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但是，当你知道由于金鸡奖对锐意创新者的热忱支持而温暖了一个艺术家的心，唤起他人生的希望和信念；那么，对于这个奖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吗？艺术是靠心来创造的，还有什么比作用于艺术家的心灵更重要的呢？

但紧随这感慨而来的，是一丝困惑：平时并不见艺谋有些许消沉之态，他的两部影片，也颇具秦王扫六合之勇。金鸡的奖赏固然是对艺谋奋斗的郑重肯定，但似乎还不至于使他联想到对生活和社会有无希望这一过于严肃的话题。难道他的内心深处，有着我所不知的创痛？

“不值得把个人的不幸反复咀嚼”

艺谋很少在人前谈自己，更不谈家事。他觉得，个人的遭际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每个人都是那么不容易，不值得把个人的不幸反复咀嚼。就象阿城所说的：“大家怎么活过，我也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由于是朋友，也由于“再深沉的人，也有一种内心释放的愿望，这对人的精神是一种暂时的解脱”（艺谋语），我才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他的经历。

艺谋的父亲和两个伯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大伯父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二伯父投奔延安未成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但这个死人在解放后很长时间内却背着个“潜伏”的罪名；父亲解放时还是个27岁的青年，虽然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却因军衔够了“线”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样的家庭背景给艺谋带来的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窘困，精神上的压抑，凡是从那段历史过来的人，都可以想见。用艺谋的话来说：“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许多干部子弟‘文革’中家庭也受了冲击，吃了不少苦。但‘文革’之后他们就翻过来了。而我们这种人，却不存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问题，永远是河这边的。”这种压抑、自卑、总觉得自己跟人家不一样的心理，在艺谋身上一直很强烈。

艺谋曾当作笑话，跟我讲过他的一件童年往事。他小时候挺贪玩，可父母手头拮据，给不了他零用钱。西安的夏天闷热难耐，为了能泡在游泳池里享受一小时的凉快劲儿，他常常流着汗蹲在更衣室，代别人看管半天衣裳。

“文革”开始后，艺谋的父亲被送到陕北放羊，当医生的母亲下放农村，他本人也到关中插队，家中留下病弱的幼弟无人照料，耳疾致聋。艺谋在农村做了三年农夫，在纺织厂当了七年搬运工。每天的活儿就是卖苦力，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再就是用手指头把四层厚的坚固呢一下撕开。

艺谋从小就尝过苦滋味，插队和当工人的经历，使他懂得了天下还有众多比他活得更艰难的百姓。因此，他并不在乎吃苦受累，只是不甘心就这样平平淡淡地了此一生。于是，就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先是给车间出板报，使自己绘画的爱好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又迷上了摄影。谁都知道摄影是耗花钱的事儿，照相机、放大机、洗印器材，缺了哪样都不行。但他每月只挣三十几元钱，还得接济没工资的父亲、年过八旬的祖母和两个未成年的弟弟。于是，他卖了血，换来一台“海鸥”牌照相机。艺谋中学的同学、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肖华，细针密线地为这台用血换来的宝贝缝了一个劳动布棉套，也缝进一片青梅竹马的绵绵情意。“海鸥”虽不是名牌洋货，艺谋却用它拍出了获全国摄影一等奖的作品。他拍的一张少女头像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据说这位待业已久的女青年竟因照片上那美丽的风采而考中了空中小姐。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进行全国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次招生，这对年届27岁，却还盼着能坐上“最后一班地铁”进大学深造的艺谋来讲，不啻是从天而降的福音。他觉得自己